

薛涌著

中国不能永远

为世界打工

云南人民出版社



F12-53

36

2006

薛涌
著

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薛涌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222 - 04592 - 9

I. 中... II. 薛... III. 经济—中国—文集
IV. F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6303 号

责任编辑: 王小燕 冯 琰

装帧设计: 陶汝昌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作 者	薛 涌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 peoplespace. net
E - 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排 版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7 - 222 - 04592 - 9
定 价	18.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目录

“世界工厂”的转移	/1
“有同情心的帝国主义”	/7
低薪危机	/10
中国闹人荒!	
——精英白领危机对我们未来的威胁	/12
中国人不能永远这么便宜	/16
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19
两种计划经济	/22
知识产权不仅仅是履行国际义务	/30
全球化的第二波	
——中国面临的危机与回应	/32
贸易壁垒之后的价值壁垒	/34
登月启示录*	/36
《京都议定书》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38
大国经济的博弈	/41
大国的黑金博弈	/45
公路上的恐怖主义	
——SUV 对我们社会安全的威胁	/51
私人车的时髦	/53
悬磁“悬”在什么上?	
——以市场规模换先进技术的大国经济博弈	/55
风力发电:未来能源战略的核心	/58
农民的私有财产也要保护	/61
农民进城,地主下乡	
——WTO 之后中国农村的自救之路	/63
梦想与现实之间	
——再论中国农村的出路	/66
村官何必限薪	/69
欠薪是个发展问题	/71
自治与维权	/73
扶贫理念的转型	/75
中国经济的转折点	/78
人口,城市化与 WTO	/84
房价挑战中国的城市发展战略	/87

房价过高将威胁城市的发展	/89
抑制房价不能仅靠政府	/91
从基层自治看房地产税	/93
经济适用房要改革不能取消	/95
住房规划与未来社会	/97
开发区之后的时代	/100
经济转型中的城市战略	/102
以社区为己任	/105
城市：自治与信赖	/107
假奶粉之后要反思什么？	/110
建立中国的“消费者报告”	/113
疫苗关涉国家安全	/115
中国的鲁班哪里去了？	/117
自行车的权利有了，产品在哪里？	/119
反对故宫门票涨价究竟代表谁的利益？	/121
富人论	/124
惊魂之中的保险业	/128
市场化中的新闻公正	/131
Shopping Mall 是否过热？	/133
医疗市场化的美国模式	/136
经济学家的“大跃进”心态	/139
从颐和园的石舫到 F1 的赛车场	/141
审计 F1	/143
发现欧洲	/145
印度的挑战	/147
印度的世纪正在到来	/150
日本会不会堵住东亚的发展之路？	/152
韩国：东亚模式的新起点	/154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谁？	/158
创造中国的生活方式	
——崛起的大国战略	/161
人民币升值，美国人想什么？	/164
何时是世界经济的下一个大萧条？	/166

“世界工厂” 的转移

全球化是美国的滑铁卢？

最近《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撰文，称全球化将使中国受益，反过来威胁到美国的地位，并警告美国可能像 19 世纪的英国那样，重蹈实行经济自由主义而衰败的悲剧（2002 年 6 月 19 日上海《国际金融报》）。

肯尼迪所依据的，是 19 世纪大英帝国由盛转衰的经验。他声称：

“1815 年击败拿破仑的军队后，英国便一跃而成全球霸主。……蒸汽机发明引致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产量急剧增长，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无论是殖民地还是非殖民地国家都需要新式的机器制成品，而且，英国还严格控制蒸汽机、纺织机和火车头等设备的出口，使其他国家不能分享到工业大革命所带来的成果。

……英国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它是商业上的强国，对外国进口商品的高关税保护了本国的市场。《谷物法》将外国的粮食排斥在国门之外，而《航海条例》则把大部分的商船和海上贸易牢牢控制在英国手中。并且，限制出口使它垄断了新式机器。

但亚当·斯密和边沁的追随者们却认为，如果打破贸易限制，并说服其他国家也同样开放本国市场，英国将变得更富有。取消关税将刺激世界贸易发展，穷国经济开始复苏，新兴市场将接纳各种英国商品：比如纺织机和纺织品，火车头以及铁轨等等。

1846 年，自由市场的信奉者掌权后，甚至要废除《谷物法》，开放英国粮食市场。不久之后，经济自由主义的优势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在 19 世纪中叶，世界迎来第一次工商业的大繁荣，英国成为生产、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中心。

然而时局突变，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随着工业和农业生产过剩，第一次全球‘大萧条’便到来了。英国仍然固守着自由贸易政策，而其他国

家纷纷树立起关税壁垒，甚至开始加重关税。美国和德国的工厂既保护了国内的市场，又可以自由地向英国出售商品，因此稳步地向一流工厂迈进。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通常都得到良好的管理，并且加大了新技术的开发和投资的力度，他们还从英国那里分享到技术和市场。而英国经济却从此江河日下，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也一去不复返。”

他于是进一步引申开来，认为在考虑目前的中美关系时，“这段历史无疑是值得深思的”。“美国现在拥有不可撼动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不能在本世纪续写荣耀”，理由是中国可能赶上来。并警告说：“中国享受着与美国一样的生活水平时，那些想当然地以为 21 世纪仍然属于美国的人，该好好想一想美国的地位了。”

肯尼迪的过时史学

他对 19 世纪世界史的解释之过时和荒谬，笔者已经另文谈及，在此仅仅简单复述：英国的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主要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英国成功地进行了“农业革命”，能够以较少的农业人口养活庞大的工业劳动大军。从 1600~1800 年间，英格兰的人口增长了 210%，从 411 万上升到 866 万，但农业人口却从总人口中的 70% 下降到了 36.25%。从 1700~1800 年间，英格兰农业人口的总数基本没有变化，土地单位面积的劳动力投入降低了 5%，农业产量却翻了一倍多。也就是说，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倍增，使农村产生大量剩余人口，涌入城市成为工业化的劳动力。

英格兰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农业成就，一大因素就是她有广阔的土地，可以采用规模经营，广种薄收。比起当时的中国江南农村来，英格兰的农场平均面积要大出一百倍，人均占有土地面积要多出四十多倍，农业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自然也要高得多，但这种粗放型农业的代价是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较低。如果英格兰的人口继续高速增长，同时又不能从海外进口粮食，那么同样规模的土地就无法养活英格兰的人口，大量的人口又不得不重新回到土地上来，通过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以保持粮食的供应。而精耕细作，又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降低，使一个农业劳动力能养活的人口越来越少，农业人口的比例不得不提高，工业化的动力就会被窒息。

这正是在 19 世纪的英格兰所可能面临的前景。1801 年，英格兰人口有 866 万，1851 年涨到 1674 万，50 年内几乎翻了一倍，比起 18 世纪的人口增长率明显加快，比起当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更是快得多。结果，英国一下子从一个粮食出口国变成了粮食进口国。这也就是肯尼迪所谓的废除《谷物法》的历史背景。最近美国史学界的新秀 Kenneth Pomeranz，在他跨越东西方文明

的巨著《分水岭：欧洲、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中令人信服地说明，一直到18世纪末，英格兰和中国江南经济的发展水平还非常接近。两者在19世纪突然拉开距离，其中原因之一，是英格兰得益于美洲的粮食和各种原材料的供应，以及美洲为英国工业产品提供的市场。北美的资源缓解了英国的人口压力和生态危机，不仅使其农业避免了精耕细作的发展道路，而且保证了工业革命基本的供应和市场。在这个意义上，限制外国粮食进口的《谷物法》若不废除，英国工业发展的历史就得重写。

新版的“中国威胁论”

然而，尽管肯尼迪依靠过了气儿的史学来支持他的结论，他还是看到了19世纪末与当今世界惊人的相似之处：“世界工厂”的转移。19世纪前半期，英国得益于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成为“世界工厂”，英制产品遍布全球，创造了“大英帝国日不落”的辉煌。然而，美国在内战后，统合了全国的经济体制，利用自己的资源和欧洲的资金、技术，飞速向西发展，形成了以铁路带动的“新经济”，使“世界工厂”渐渐向美国移动。实际上，这也是美国取代大英帝国而成为世界首霸的转折点。

如今的世界，正在发生一个十分类似的事件：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投资纷纷涌向中国。从纺织业、汽车制造到高科技的电子产品，跨国公司纷纷把自己的生产基地从美国、日本乃至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移往中国。人们惊呼：中国正在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这一“世界工厂”的大转移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在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引起了强烈的心理震撼。肯尼迪并不是出来呼吁警惕中国的第一个人。最近，在美国商业界有广泛影响的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 Jeffrey Garten 在《商业周刊》上撰文指出：中国正在变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位置，很快就会相当于沙特阿拉伯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的地位。世界经济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依赖，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一旦中国经济受到战争、恐怖袭击、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的打击，美国经济的“生命线”就可能被掐断。他建议：布什政府应成立一个政府与商界的联合研究小组来审视这一问题，并通过税收与关税等措施，使加勒比海地区成为对外国投资者更有吸引力的生产基地，并要求中国加强对其工业带的安全保护，等等。

美国的这种“警惕中国的崛起”的呼声，一方面会刺激中国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又会在中国人中导致一种盲目乐观的精神，觉得自己很快就会取美国而代之了。仅仅是在不久以前，许多人还相信中国的 GDP 将在

2015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然而，如果冷静地审视这两个彼此相距 100 多年的“世界工厂”的大转移，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根本不可能像当年美国取代大英帝国那样取美国而代之。相反，如果中国不进行深入的改革，目前在制造业上的优势就会维持不住，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将渐渐减弱。

“世界工厂”的第一次转移

美国当年比起英国来，有明显的资源优势，而且，美国不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没有要维持一个“日不落之国”的沉重财政负担。一直到二战之前，英国实际上都是美国的一道免费屏障，挡住了许多来自欧洲的麻烦。但更重要的是，美国自由的经济体制茁壮成长，能够在竞争中吸收欧洲的资金，开发美国的资源，最终成为世界的中心。

美国经济的崛起过程，实际上也是财经制度的建设过程。19 世纪末，美国的西部开发带动了以铁路为标志的新经济（或者可以说是铁路带动了西部开发），与最近的 IT 经济颇有些类似之处。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铺设了 75 000 英里的铁路，创了世界纪录；铁路的投资从 1870 年的 25 亿美元跃升至 1890 年的 100 亿美元。

铁路经济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财富，自然驱动利欲熏心的人们进行投机。大企业乘机吹起“铁路泡沫”，把一钱不值的股票卖给一心想发财的投资者，牟取暴利，甚至修建与现有铁路线平行的劣质铁路线，以求原铁路线的公司能够将这一竞争的新线高价买断；更有投机家为抬高自己铁路的股票，创立假公司为自己的公司支付荒谬的高价，造成虚假的利润（这也是后来英隆、安达信的经典伎俩）。结果，金融丑闻层出不穷，铁路泡沫最终破灭。既有的从农业社会中演化出来的制度，根本应付不了这一充满了希望和陷阱的新经济格局。

制度的建设

也正是在这一时刻，美国出现了一代制度建设者。其中有两个人在最近常常被人们提起：一个是银行家 John Pierpont Morgan，一个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Morgan 早年在伦敦他父亲的金融事务所中供职，1860 年在纽约组建 J. P. Morgan & Co. 作为他父亲公司在美国的代理。1879 年，他变成了美国铁路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财源。在当时的“牛仔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政府没有能力和授权来控制新经济的混乱的发展，但 Morgan 却有办法：他控制着银行。当时新兴的美国经济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铁路的高速扩张，钱要从金融之都伦敦来。而 Morgan 通过固定资产的抵押和他所谓的“道德责任”来保

证投资者的利益。当他所支持的公司破产后，他马上把公司接过来，重整财政，清还债务，了结官司，解雇经理，雇用新人，监督公司的财务运转，有时不惜卷入其中几十年，直到公司重新开始盈利、投资者得到回报。

Morgan 理财虽然很受争议，但他却能忠实地监管着成千上万分散的中小投资者的财富，保证他们的回报，使欧洲的资本源源不绝地流入美国。1912 年，国会一个调查委员会的律师问他，银行是否只应该给那些已经有了钱和财产的人提供贷款时，他坚决回答：“不是，先生，首先要看的是品格。”那位律师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Morgan 用维多利亚式的语句一板一眼地说：“我信不过的人不要想在基督的土地上拿到我的一分钱！”最近布什在华尔街讲“没有良知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品格就没有财富”，就是从 Morgan 这里抄来的。Morgan 为金融界建立的信誉，成为美国繁荣的基础，在今天的金融丑闻中，仍然是人们追求的楷模。

1901 年上台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另一位制度建设者。他身为共和党总统，却敢于对支持本党的大企业开刀，前后以反托拉斯的名义兴讼 45 次，惩罚不法的大企业。他的名言是：“我们要求大企业给人民公平的交易（square deal），同时，我们坚持所有那些诚实的大企业也应该得到公平的交易。”他因此得名“托拉斯的破坏者”（trustbuster），严厉禁止大企业操纵市场，对富人收财产税，甚至最早采取措施保护环境，驯服了野性十足的“牛仔资本主义”。

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建设，我们很难想象美国仅仅靠自己的资源就可以把大英帝国的“世界工厂”搬到自己的家里来，因为资本只会往安全、可靠的地方流动。大量投资者需要“公平的交易”。目前中国面临的局面，与 19 世纪末的美国颇为类似。中国自身没有足够的资本来支持目前这样迅猛的经济扩张，外资因而成为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是中国的金融体制是否有 Morgan 那样的信誉？中小投资者是否能够在中國获得“公平的交易”？这是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工厂”的先决条件。

中国能否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平均每年吸引 400 亿美元的外资。加入 WTO 后，吸引外资的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中国之所以能如此，一是得益于劳工成本低，工资水平只相当于美国、日本的 5%，墨西哥、匈牙利的 1/3；另一因素则是近年社会相对稳定。然而，从长远看，这两个因素是相克而非相生的。如果 10 年后中国的工资水平还是这样低，这样“有竞争力”，说明大部分中国人没有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社会就会变得不稳定。如果中国能够稳步发展，

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劳工成本的优势就会被削弱。中国必须发展出其他的优势来吸引外资。

另外，中国的外资，大多是随着跨国公司而来。这些大公司有力量和中国政府讨价还价，捍卫自己的利益，但一般中小投资者则远没有这样的信心。中国还不具 Morgan 式的信誉和机制，使海外的中小投资者大规模地直接投资于国内的企业。这势必妨碍国内企业的成长，也是中国至今出不了世界一流大企业的原因之一。从外资的绝对数字来看，中国吸引的外资的确可观，但若以人均外资数额来看，就远远没有那么令人惊喜。比如过去 4 年间，520 亿美元的外国投资涌入人口不足 5000 万的韩国，这就意味着韩国的人均外资比同期的中国高八倍左右。1900 年，美国制造业的资本总额有 100 亿美元，但投放到美国经济中的欧洲资本竟达 33 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还远远没有像 19 世纪末的美国那样，成为国际资本的聚汇之地。

反省 19 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工厂”的转移，既决定于国际资本的流向，又决定于这一“世界工厂”所在国的本土企业的成长。当年美国靠的是欧洲的资本，但建立的是自己的企业，中国的外资，则是外国的资本、外国的企业。中国的国内企业，还远不具备从国际中小投资者那里直接吸取资金的能力。美国在 20 世纪末成长起来的中产“投资阶级”，在 2000 年春天以来的股市泡沫破灭中损失了 50 000 亿美元的资产，但他们仍然拥有 100 000 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基本上相当于美国的 GDP，是国际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的企业能不能从他们那里直接获得资金，将决定中国的企业能否与国际企业竞争，更决定了“世界工厂”是否能够在中国形成。

“有同情心的帝国主义”

从西雅图到热那亚，反全球化的抗议者们盯上了西方大国的首脑。他们的头号敌人布什，高擎着“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大旗；这些示威者的诉求虽然模糊不清，但他们的运动，也可一语概括：“有同情心的帝国主义”。

他们确实很有同情心。他们要保护环境、保护儿童、捍卫人权、帮助第三世界摆脱贫困。谁能有理由反对这些呢？然而当他们把这些信条和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时，就出了问题。在他们看来，全球化破坏环境、侵犯人权，因为贸易壁垒一旦消失，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产品就会大量涌入他们所生活的“文明社会”。在他们看来，这些产品大多是童工、强制劳动力或拿着极低的工资的苦力制造的。更糟的是，这些国家为了向西方提供这种廉价产品，完全置环境于不顾，价格要比处处受制于环境法的西方企业的产品便宜得多。全球化的结果，就是使这种以人权和环境为代价的“野蛮”产品，在自由竞争中击败西方的“文明”产品。说白了，这一逻辑就是要将第三世界排拒在自由贸易之外。

穷不是一件舒服的事。穷孩子面临的选择不是“去干活还是去上学”，而是“要么干活要么挨饿”。不仅非洲国家如此，当年的西方列强也不例外。在1860年工业革命中的英格兰，40%的10~14岁的孩子是赚钱的劳力，即每周要工作60小时左右。而那时英国的工人，因得益于本国对海外的掠夺，生活水平比其他国家的工人高得多，被称为“工人贵族”。如今的非洲，恐怕比当时的大英帝国要穷，但非洲同龄的男孩子，只有不到30%被雇用，印度的比率则是这个数字的一半。送孩子去当童工是生活所迫，除非有人为孩子付生活费和学费，否则家长别无选择。康乃尔大学教授Kaushuk Basu的研究表明，第三世界的父母很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旦条件容许，他们马上会让自己的孩子摆脱童工的命运，和美国的家长在行为方式上并无本质的不同。在1890~1930年期间，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75%，结果童工减少了几乎同样的百分点。自1950年以来，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均收入的提高，童工的比率也在跟着减少。

美国人常常把童工当人权问题来向别国施压，力求在贸易谈判上占领道德高地。然而美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当今美国 15 ~ 19 岁的孩子，64% 在一边上学一边打工，而且有研究表明这种打工生活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业，甚至引起长期的睡眠不足，妨碍他们的身心发育。在北京、上海这样的第三世界大都市，有如此不幸命运的孩子的比率，恐怕不及美国的一半吧？

强制劳动的问题更是滑稽。如今一提“强制”似乎就有人权问题。可是为什么能强制犯人坐牢，不能强制犯人劳动呢？根据七八年前的数字，在美国一个犯人蹲一年监狱给政府带来的开销，是 3 ~ 4 万美元。这笔钱，足够你送自己的孩子上哈佛、耶鲁一年，支付所有的学费、生活费。像索马里这样的国家，能够这样养一个罪犯吗？在一个正常人还没饭吃的国家，凭什么犯人可以不干活白吃饭呢？事实上，美国的监狱人口，雄居世界第一，而公司拿犯人当廉价劳动力，一直就是家常便饭。

那些享受着一年 2 万美元的教育、有钱跟着大国首脑的行踪周游世界、对第三世界的经验最多不过是旅游观光的热血青年们，似乎觉得他们最知道他们从未去过的穷国的穷人的疾苦和利益，他们可以为这些穷人选择生活的道路：饿几天没关系，不要过于劳累，不要去受资本家的剥削。他们要求限制第三世界童工的工作时间，对穷人的生活方式指手画脚，与当年对殖民地国家指手画脚的帝国主义，如出一辙。可惜，大多数穷人，怕是觉得自己最理解自己的处境，不会相信这些“海外顾问”。其实，这些富裕的青年们真若有意帮助那些苦难的儿童，不妨把去热那亚的旅费省下来，把示威的时间用来工作，然后把这样省下来的和挣到的钱通过民间组织交给那些童工的家长，这才能帮助童工们从工厂走向学校。

然而他们不会这样做，对此你也不会奇怪。因为他们的同情心是对着他们自己，并非对着第三世界。没有全球化，美国的一个清洁工，也会比中国的一个高级工程师的收入高出数倍。全球化后，这位中国的工程师不仅收入大增，甚至会夺走美国同行的饭碗。这才是他们要抗议的。

我们在西雅图和热那亚看到的，不仅是街头的反对运动，而且是一些富国中低阶层为了保障自己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而压制第三世界崛起的政治潜流。这一潜流，并不仅仅限于左翼的反体制运动，未来很可能在一些国家成为政治主流。美国的右翼政治家、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坎南，就是一位反全球化的领袖。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左翼的反全球化运动则汇集在耐德尔的绿党的左翼大旗下，最后等于把白宫交给了布什。而戈尔在重压之下，也反复表示自由贸易要考虑人权和环境因素，明显从克林顿的自由贸易的立场后退，若不是阴差阳错，此人现在本应坐在白宫里面。就是一贯支持自由贸易

的布什，最近也对外国的钢铁产品树起贸易保护的壁垒。可见，这些抗议者的诉求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并非那么困难。

全球化逼着各国提高经济竞争力，提高劳工的素质。发达国家只能靠高技术和优异的管理与穷国竞争，不再可能与孟加拉这样的国家比谁做出来的衣服更便宜。你挣钱多是因为你的劳动工具是计算机而不是锄头，并不是因为你是美国公民。可惜的是，在当今的美国，1/3 的四年级学生不识字。这些人长大后，还是只会使用锄头，在发达社会成为多余的人。与第三世界的童工们有最大的利益冲突的，正是这些人。要知道，当年的英国工业革命，也制造了许多这类的多余的人，他们很多被当作罪犯解送海外，整整一个澳大利亚，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如今这些 IT 革命的多余的人不再有澳大利亚这样的地方可去，只能留在国内，但是他们有选票。许多会使用计算机的同胞，因为可能被第三世界的更聪明能干的同行挤掉，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的力量会日益壮大，最终有可能逼迫他们的政府，封杀第三世界的崛起。因此，未来的第三世界，不仅会受布什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恫吓，怕是还会受到西雅图、热那亚街头“有同情心的帝国主义”的围剿。

低薪危机

改革 20 多年，中国经济高速起飞。从 1980 年至今，国民经济总产值年平均增长 10% 以上。与此同期，美国和日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3% 左右。然而，从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以年薪计）上看，日本人的工资从 1980 年的 1 万美元出头，增至如今的 3.5 万美元左右。其中 90 年代中期一度达到 4.5 万美元左右，几乎比美国人的工资高出 2 万美元，成为世界上最贵的劳工。美国人的工资，在 1980 年为 1.5 万美元上下，如今维持 3.2 万美元上下的水平。也就是说，从 1980 年至今，日本人的工资几乎涨了三倍，美国人的工资也翻了一番。中国的数据，在 80 年代前半期由于计划经济中的福利、物价等因素而缺乏可比性。从 1996 ~ 2002 年，官方的统计表明工资翻了一番，但许多厂家则称这段时间工资没有提高，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尽管统计数据的精确度上多有可争议之处，但与日、美粗略的比较至少表明，中国比人家快三倍的高速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工资水平的相应大幅度提高。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从高速经济增长中受益。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调查，1990 年中国大致有 3.5 亿人口生活在一天 1 美元以下的生活水平。到 2000 年，这个数字跌到 2 亿。大量农村劳工涌入城市，压低了城市的工资，却使许多农民脱贫。这应该说是个不小的成就。

如今，中国农村还有大约 1.5 亿的无业劳动力，比美国整个劳动大军的人数还多。这一严酷的事实，将不可避免地在长时间内压低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正是由于有这样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外资大举进军中国，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廉价劳动力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

然而，如果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得过低，就将会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长远的危机。

众所周知，劳动力费用低会带来竞争优势，但是，人们常常把工资和劳动力费用混为一谈。工资衡量的是单位时间内的工人收入；劳动力费用则是衡量单位产值所需的劳动力耗费。当工人挣高一倍的工资，却在单位时间内

生产出三倍的产值的时候，劳动力费用不是上涨，而是下降。《华尔街时报》讲了个生动的例子：在现代工业部门，印度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15%。如果你付给印度工人相当于美国工人1/5的工资，印度的劳动力费用还是比美国的贵。

廉价劳动力，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工作机会，但是，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工收入太低，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进行投资，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出现了笔者所谓的“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的局面。最终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停滞。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未来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最大的谬误。目前，由于劳动力过于廉价，在中国的厂家宁愿通过降低自己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含量来追求效益。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的盈利。这就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国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在短期内，这对中国并不构成重大的问题，因为低得出奇的工资毕竟降低了劳动力的费用，引来的外资也解决了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如前所述，工资只是劳动力费用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靠工资低降低了劳动力费用，不用考虑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明天则可能因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使劳动力费用居高不下，结果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抑制劳动力费用的上涨，而低工资反过来又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反观印度，劳工的劳动生产率虽低，工程师们的劳动生产率则和美国的同行接近，这就降低了印度在这个领域的劳动力费用。结果，美国的计算机、高科技后勤服务业纷纷进入印度。当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时，印度成了“世界办公室”。看来，吸引外资，也并非只有压低工资这一条路。

在未来50年内，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奏效，中国人口迅速进入老龄化的阶段，每个劳动力需要养活的人数将大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低，压低了工资，使每个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微乎其微。不要说投资下一代的教育，就是连维持自己的生计、抚养老人也很难支持。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之时，及时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着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日本的机器人使用率为世界之最。如今，日本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又经历了10多年的低沉，但之所以能在一个劳动力要养活更多人口的劣势下重新复苏，和60年代初的远见恐怕不无关系。当今的中国，正在面临同样的抉择。

中国闹人荒!

——精英白领危机对我们未来的威胁

“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这话几乎成了“真理”，没有人会反对。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竟开始闹人荒，而且并不是限于某个特殊部门，许多领域都出现了找不到人干活的现象。

前一段的“民工荒”，实际上证实了笔者在此之前对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预言，只是预言兑现得比笔者预料得快而已。如今另一个领域——高级管理层——又出现严重缺人的现象。这一领域的精英白领供给严重不足，可能比“民工荒”对中国经济产生更严重的威胁。

不久前，英国的《经济学人》从外资的角度就中国的经济人才问题进行了报道。目前外企在中国的投资，每周高达10亿美元。外资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这么大笔的资金，谁来经营？外企纷纷抱怨找不到人。

Oracle 中国南方及香港分部的执行经理 Arics Poon 最近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必须（在中国）找到一群能力强、有职业精神的经理，否则就无法维持我们在中国的增长。”著名的会计公司 Ernst&Young 中国与香港分部的总裁 Anthony Wu 也承认：“我们已经决定不接一些主要客户，因为我们没有人手向他们提供服务。”

外企在中国扎根，就必须“本土化”，用当地的人才替代从本国派来的高薪管理人员，减少费用，否则就无优势可言。如今，给外企服务的中国精英白领已经收入不菲。根据《经济学人》的调查，在京、沪两大城市，外企中层的中方经理，年收入（包括工资和年终红利）可达2.7~3.2万美元，大致20多万人民币；高级经理则收入高达4.6~5.4万美元，相当于三四十万人民币；企业总裁则岁入8~9万美元，即六七十万人民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般经营消费品的医药公司，在美国一个有MBA的雇员可以挣到8.5~9.5万美元的年薪，在亚洲的职位只有这个数的一半。以这个标准衡量，中国的白领的收入还是给外企省了一些钱。但是，如今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仅为2%。这些精英白领的工资上涨率则为6%~10%，甚至有过50%这样神话般